

中共执政党 建设史

(1978—2009)

Zhonggongzhizhengdang
jiansheshi

武国友 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共执政党 建设史

(1978—2009)

Zhonggongzhizhengdang
jiansheshi

武国友 著

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

© 武国友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执政党建设史: 1978~2009/ 武国友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205-06634-5

I. ①中… II. ①武…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党史—1978~2009 IV. ①D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63164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2.75

插 页: 1

字 数: 39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董 喃 田 杨 马 辉

封面设计: 杜 江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吴艳杰 耿 珺 刘再升

书 号: ISBN 978-7-205-06634-5

定 价: 40.00 元

序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始终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问题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要把党建设好。建设好一个善于治国理政的执政党，不但要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出发，准确把握时代特点，紧紧围绕现实需要，朝着未来的发展目标努力奋斗，而且还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和把握党的建设的规律。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研究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还要研究党的建设的历史。目前，总的看，这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党的建设史的著作也不少，但是撰写一部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党建设史，尤其是一部体现新时期党的建设特点的历史著作，仍然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史是研究和探求党的建设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主要是研究党的建设的纵向发展变化过程及其引起这种发展变化的起因，重大党建事件的来龙去脉、历史意义及现实影响，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经验等等。通过对党的建设史的研究，深化对党的建设历程的认识，汲取其中的有益经验，防止重犯历史性的错误，以更好地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健康发展。

当然，写出一部权威的党建史并非易事。显然，它要展现党建理论的框架体系和发展脉络。从历史的、动态的发展脉络来展现党建原理的形成和发展，通过历史事件描述和展现党建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党的

工作中心的变化，特别是阶级、阶层构成的变化，致使党的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党的建设传统做法中哪些需要继续发扬，哪些需要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怎样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的需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应如何改进，怎样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所有这些都是广大党员干部关心的重要问题，理应在党史研究和撰写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中共执政党建设史》这部著作，从纵向发展的视角架构起一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事业互动发展的逻辑关系体系，较好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来党的建设整体面貌，突出反映了党所处历史方位的变化和党的执政理论的发展。从这部著作的大脉络不难看出，党所处历史方位的转变，是从1949年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开始的。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包括夺取全国政权后，党在城市工作中要以发展生产为中心，要牢记“两个务必”等思想，这已经体现了执政党的意识，即党已经在考虑从在全国执政的角度来加强自身建设了。但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特别是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我国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作出错误估计，并在1963年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党尽管强化了“巩固政权”的执政意识，但是这种“强化”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强化的，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很好地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而使党的建设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差，乃至在“左”倾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五十字”建党纲领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果断地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了工作中心的转移，也开始了历史方位的转变。由此，党才真正从更完全的意义上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一个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个转变，是带有根本性的转变，给党的建设提出了诸多新课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转变，对如何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中共十二大召开前，邓小平曾提出了一个事关党的建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算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根据这样的思考，中共十二大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发扬

党的优良传统，提高党的战斗力，坚决实现以下三项基本要求：第一，思想上、政治上高度一致；第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三，坚持民主集中制。特别是，鲜明地提出了党要加强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领导，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3年，邓小平提出党建目标——“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这已表明，十二大前后党中央已经开始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转变这一实际情况出发，把执政党的建设问题郑重地提上了议事日程。此后，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从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出发，从不同角度提出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特别是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要从执政能力的高度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中共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提出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历史方位转变和执政党建设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从执政党建设理论方面来说，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党的建设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和进步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从指导思想层面来看，这30多年总的来说是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主要是通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29年，使毛泽东思想得到发展和延伸，形成毛泽东思想当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了准备。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七大，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又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从具体理论层面来看，在这60年，党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 and 理论创新，形成了一系列党的建设的新认识和新思想，主要有：关于党的最高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主线和总体布局的思想；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全面加强，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的思想；关于增强党的执政意识，改进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思想；关于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发展党内民主、促进党内和谐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党与政权机构之间的关系，正确处

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关系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等等。这些党的建设的新思想、新论断，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

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实践和理论探索，党的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思想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组织建设获得巨大发展，作风建设有了明显进步，制度建设实现重大突破，反腐倡廉建设取得重要成果。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考验，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更加坚强，已当之无愧地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目前，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过程中，《中共执政党的建设史》这一著作的问世，不仅对于深化党的建设史的研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果，而且必然会对进一步推动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起到应有的作用。

谷安林

2009年10月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1

- 一、“文化大革命”对党造成的极大破坏 /1
- 二、深入揭批“四人帮”，清除“文化大革命”遗害 /6
- 三、恢复党和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秩序 /13
- 四、“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及其危害 /18
- 五、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展开 /22

第二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自身的拨乱反正 /32

-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的政治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32
- 二、理论务虚会和四项基本原则问题的提出 /47
- 三、新形势下党建任务的提出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制定 /54
- 四、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 /67
- 五、对林彪、江青阴谋集团案的审理 /78
- 六、历史问题决议的通过，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完成 /80

第三章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开始和党组织的调整与整顿 /92

- 一、邓小平“八一八”讲话的发表 /92
- 二、中共十二大和新党章的制定 /100
- 三、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面整党 /109

四、确定选拔干部的标准，改革党政领导机构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119

五、坚持改革干部制度，推动干部“四化”的新发展/128

第四章 努力探索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加强党建的新路子/135

一、中共十三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135

二、从严治党方针的提出和开展廉政建设的努力/149

三、建立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制度和党员民主评议制度/156

四、在外商投资企业和农村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初步探索/163

五、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的发生及其被平息/169

第五章 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顺利交替/175

一、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175

二、发出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和作出加强党群关系的决定/183

三、全面考察县处级以上干部和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192

四、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8

五、干部交流制度的建立及其实践探索/205

第六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党的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211

一、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党的建设产生的重大影响/211

二、中共十四大党章的修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216

三、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任务的提出/223

四、加强对青年干部的培养和教育/232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考验/240

第七章 以改革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46

一、党的建设总目标和总任务的明确提出/246

二、全国党员学理论学党章活动的开展/250

三、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254

四、党的各级基层组织建设的全面部署/263

五、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272

第八章 按照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做出党建新部署/280

- 一、面向新世纪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280
- 二、中共十五大与面向新世纪的党建新部署/283
- 三、制定反腐倡廉各项规章和确立反腐败斗争三项工作格局/286
- 四、以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291
- 五、进一步推广和规范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298

第九章 努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307

- 一、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307
- 二、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311
- 三、中共十六大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316
- 四、提出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325
- 五、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331
- 六、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336
- 七、中共十七大与党建总体思路的深化和科学发展精神的贯彻/341

结束语/350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徘徊前进两年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党的建设也同党的全部工作一样，经历了一个徘徊前进的过程。这个阶段党的各项建设还无法全面展开，针对当时的实际，主要是集中抓了清理“文化大革命”影响，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政治生活秩序，逐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等方面的工作。

一、“文化大革命”对党造成的极大破坏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代表中央政治局，适应党和人民的愿望，作出坚决果断的决策，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粉碎了“四人帮”阴谋集团。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开辟创造了条件。

“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和国家及广大人民群众造成极大灾难的一场内乱。这场内乱给党的思想理论、体制机制、各级组织以及党与群众关系等各个方面，都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在思想理论问题上，“文化大革命”极力推行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小农经济眼界基础上主观形成的毛泽东的所谓纯洁社会主义理想，是要在落后的以手工生产为主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起在县乡范围内，既要在生产上亦工、亦农、亦副、亦渔、亦商，又要能够亦文、亦武，在人才上也是要达到一业为主兼能其他，即达到所谓一专多能的水平，同时还要劳武结合即要把生产劳动同全民武装结合起来，这样的人民公社，再以人民公社为社会基础组成整个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他是想通过生产上的全面发展，做到社会基础的自给自足，以免受国际帝国主义的盘剥；以人才上的一专多能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打造了他在经济上的理想模式，1966年发出的“五七指示”又打造了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理想模式，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打造出消灭三大差别的完美社会，从而完成了

他关于纯洁社会主义理想的构建。这种理想实际上是一种脱离生产力发展实际的小农经济的幻想，理所当然地会在实践中到处碰壁。然而，在思想认识上习惯于强调主观作用的毛泽东，则往往错误地把这种主观幻想在实践中的碰壁所引发的党内不同意见看成是路线之争，甚至看成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林彪、“四人帮”则利用毛泽东的这一错误，并将其推向极端，把毛泽东的主观幻想吹捧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高峰”，于是对毛泽东的主观幻想表示的不同意见就成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甚至是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同时，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际形势的日趋紧张加剧了党内的不同意见分歧。先是中苏两党、两国意识形态分歧的加剧最终使两国关系走向破裂，并由此引发了我国与世界上许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不断恶化。与此同时，美国对越南日益升级的侵略战争又严重威胁到了我国的安全。在美国的支持下，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也在我国边境地区频繁制造事端。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形势，增加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前途的危机感。由于未能科学正确地认识其中的矛盾，因而从1956年开始出现过“左”的错误观点，到20世纪60年代进而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党的思想理论由此走向扭曲。

在政治问题上，“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党的工作重点和斗争方向。早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共八大就曾正确地指出，在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①。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这种需要已经变成党的主要任务，因此党的工作重心应当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57年2月，毛泽东又曾强调，在当时，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之后，暴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党的主要任务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向自然界开战。可是，从反右派斗争开始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观点，经过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及随后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日益系统化和激烈化并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党内“左”的观点发展的具体表现。“文化大革命”中在政治上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

一是党的工作中心和重点错误地放在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斗争上，而不是放在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上。“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和江青等人就极力叫嚷要突出政治，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甚至强调政治可以冲击业务、冲击经济、冲击一切。他们强烈反对以经济压政治，反对不问政治只抓业务的所谓“白专道路”，强烈批评那种“只顾埋头拉车，不去抬头看路”的倾向。林彪、江青等人的做法，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更是进一步把政治斗争抬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这场“革命”实际上是在越来越严重地冲击着一切，为了支持由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学校，随后是一切文化事业单位，都停止活动，给“文化大革命”让路。接着，各厂矿、商店等经济单位也纷纷停产闹“革命”。最后是党政机关也被这场“革命”冲击，使得国家的各项建设受到极大的损害。

二是政治斗争的方向错误地定在党内。本来在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一场空前伟大同时也是一场空前复杂的事业，而且这个事业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基础之上和国际形势处于复杂多变的环境之中展开的，这就更增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势，在担任社会主义建设领导任务的共产党内，对于形势的估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产生意见分歧是正常的现象。可是，毛泽东对形势估计却过于严重了，而且又过分相信自己意见的正确性，过分看重分歧意见的危险性，并教条式地把这种分歧搬进党内，得出资产阶级在党内和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结论。于是本来属于党内斗争范围的对不同意见的批评，由于估计得过于严重，而使之超出党内的范围，发展成为错误的社会阶级斗争。特别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概念的提出和公开认定，必然会大规模地公开揭露党内的所谓“阴暗面”，损害了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严重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降低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领导者的党的声望和权威，极大地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三是在斗争的方式方法上，错误地采取了发动群众进行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形式，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在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威文件《十六条》中，就规定这次运动的任务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而依靠力量则是所谓的“左派”和“不出名的革命小将”。对开展运动的方针和方法，《十六条》又规定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就是说，这次运动的打击面是相当宽的，方法上通过利用“四大”等形式，采取大轰大嗡的暴风雨式阶级斗争的方法。尤其是“四大”，它成了掀起所谓的“革命”

声势，搞乱党的组织和各种社会组织，破坏社会秩序，制造动乱的工具，是一种对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民主自由权利进行摧残的专政手段。“四大”的一个严重恶果就是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弥漫于整个社会，从对所有的组织领导机构的不信任，发展到对一切社会组织机构的不信任；从对所有的领导干部和负责人员的不信任，发展到对一切社会人员的不信任。在这方面，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资（走资派）、知（臭知识分子），再加上海外关系等等，加在一起在人口总数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四人帮”搞的所谓“清队”（即“清理阶级队伍”）典型“六厂二校经验”里，清华大学 6000 人的教职工中，被立案审查的达 1228 人，被定为敌我矛盾的 178 人，再加上被冲击批判的 2000 多人，竟占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被冤枉的。

在党的组织问题上，“文化大革命”使正常的党内生活遭到严重破坏。首先是在党的组织体系上的破坏。因为“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内的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极其冤枉地点出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随后又通过《十六条》明确了斗争方向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号召大规模开展群众性的揭批运动的情况下，各级党的组织及其领导集体，纷纷受到冲击，而后“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甚至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于是，党的组织基本上停止活动。以后经过“一月夺权”、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和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大肆发展党羽，通过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在党内扩张其帮派势力。比如浙江省 1974 年一年就突击发展党员 36000 人，突击提干约 9000 人。上海市的工交系统，在 30 多个局级单位提拔的正副书记中，有 40% 是被王洪文等直接点名提拔的。在参加他们开办的学习班学习的 114 名学员中，72 名被提拔安插到了市、区、县各级的重要岗位上，控制了上海市各级领导权。河南省在 1974 年的头九个月就突击发展党员 45000 人，其中范县一县 7 天中就突击发展党员 2000 多人，致使有的单位新党员超过原有党员三四倍。全省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四次“双突”，入党 24 万人，占“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党员总人数 56 万人的 43%。湖南省在 3 月到 5 月的 3 个月内，全省企业单位和机关突击发展党员 5000 人，突击提干 1000 人。这种“双突”活动，给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带来严重后果^①。由于各级党政干部成为被“打倒”的目标，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基层，“文化大革命”前的党政主要领导几乎全部被“打倒”、罢官，党内一大批有水平、

^① 冯文彬、高狄、王茂林、王瑞璞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全书》第四卷，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3 页。

有经验、有威望的同志离开领导岗位，而代之以一大批造反起家的人。其次是在党的组织原则上的破坏。1967年1月“夺权”以后，全国陆续建立了“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建立了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高度集权制。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体制下，党的集体领导名存实亡，“反潮流”精神和派性在党内泛滥开来。再加上，在林彪的吹捧之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急剧发展，个人专断发展到党的历史上最严重的地步。中共九大和十大的党章中取消了党内民主、集体领导、党员权利和义务等在党的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条文，使党内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民主生活无法进行。再次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受到严重破坏。在长期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斗争中，党形成了一整套优良的传统作风。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优良的传统作风被所谓的“革命”和“造反”所冲击，在广大干部党员思想里引起了深深的怀疑。而两个反革命集团又大搞理论上的形而上学，实践上的打、砸、抢、抄、抓和制造大规模的冤假错案，在党内斗争中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且把帮派体系中的一套旧帮会甚至是黑社会里的帮会作风，诸如结党营私、投机取巧、看风使舵、颠倒黑白等风气搬进党内，污染了党内的空气，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形象。

在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文化大革命”使群众对党产生了某种程度的隔阂。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除了通过党员、干部的模范行动和他们所体现的优良传统作风对群众发生了重要影响外，主要是通过党的政策给人们以各种各样的利益，来加强这种联系。在这方面，“文化大革命”所执行的过“左”政策，再加上林彪、“四人帮”的胡作非为，大大加深了人民群众与党之间的隔阂：首先是在经济政策上，“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坚持所谓“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实际上则经常是以“革命”来压生产，甚至是冲击生产。在工业上“四人帮”鼓吹冲破“条条框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批判埋头建设的干部和工人是什么“只顾低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他们还把一些工业生产中的十分必要的规则和制度说成是必须反掉的资本主义的“管、卡、压”。1975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各条战线所进行的整顿，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四人帮”又在毛泽东的默许和支持下，刮起了“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了关于加强经济和科学技术工作领导的所谓“三株大毒草”，结果使得工业战线上刚刚有所恢复的生产建设又遭到严重的破坏；在农业生产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此前批判“包产到户”的基础上，对农村的所谓资本主义倾向的批判愈演愈烈，竟把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制度中不能缺少的自留地、自由市场和家庭副业，也批判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而把农村的绝大多数劳动力其中包括妇女劳动力都组织到集体生产中的“老十分”和

“大帮轰”当中，抑制了农业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得农业生产不断下降，农业技术改造停滞不前。“文化大革命”中所制定和实行的过“左”的经济政策和林彪、“四人帮”在经济方面的倒行逆施，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在文化教育领域，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因过“左”的估计，而使其发展受到相当的限制；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是在文化教育上开的刀。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损害和破坏也最为严重。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同意的江青在解放军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认定，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后又炮制所谓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域的黑线专政论和教育领域的“两个估计”成了压在文化教育界的两座大山，不仅给文化教育的发展繁荣造成极大破坏，而且深深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的心灵。所有这些，都损害和疏远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党的政策中存在着的“左”的错误和以党的名义出现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实际上是在损害和破坏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声望已经开始发生动摇。

二、深入揭批“四人帮”，清除“文化大革命”遗害

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不论从理论清理，还是从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已成了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社会的第一件大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成果，实现全党和全国的安定团结，扫除党和国家继续前进的障碍。

（一）揭批“四人帮”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即领导全党展开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运动。“四人帮”集团的罪恶活动与林彪集团由“五七一工程纪要”所揭示出来的公然的阴谋活动有所区别。“四人帮”的特点：一是身居高位，如王洪文时任党中央副主席，主持党的工作，张春桥当时也是国务院副总理兼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姚文元握有宣传口大权，江青不仅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一直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职务，而且作为毛泽东妻子这一特殊身份也使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广大群众中有着特殊的影响。二是他们中的张、姚二人是文人，所谓党内的秀才，写的文章，辞藻华美，笔锋犀利，颇具文采，在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而且又是以毛泽东思想理论的阐释者身份在“文化大

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一直在身上笼罩着毛泽东的光环。三是他们都在毛泽东“左”的观点和思想理论的推行过程中，也就是在历史上的某些重大政治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如江青就曾在批判《武训传》中有过表现，在京剧革命中也曾“呕心沥血”付出过辛苦。张春桥在1958年提倡“共产风”时，曾写过比较有影响的文章；而姚文元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录此为照》一文，曾引起广泛关注。当时，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之下，他们也曾获得过较多的赞誉。四是他们的破坏活动都是打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旗号来进行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左”的错误路线，虽然因其严重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而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应该说毛泽东的主观动机是好的，它饱含着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憧憬，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要求快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因此，毛泽东的错误对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不久、当时尚且贫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是有相当社会基础的。再加上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都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干自己的勾当，而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功绩，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是占有相当地位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四人帮”阴谋活动的本质，不利于广大群众对其形成清醒的认识。

由于“四人帮”的上述特点容易使部分人民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正义行动产生迷惑，为了揭穿“四人帮”的反动本质，肃清其影响，中共中央于1976年12月10日下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开始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党中央领导下，发动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群众斗争，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是肃清“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残余影响以团结起广大人民群众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分清思想理论是非、政策是非的需要。“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阴谋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利用毛泽东“左”的错误，并将其推向极端，制造了大量的谬论，搞了无数的阴谋诡计，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展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群众性斗争就成了当时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

为了有效地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群众性斗争，1976年10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的审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专案组，审